

美國經濟與政治支持關係的計量分析

何思因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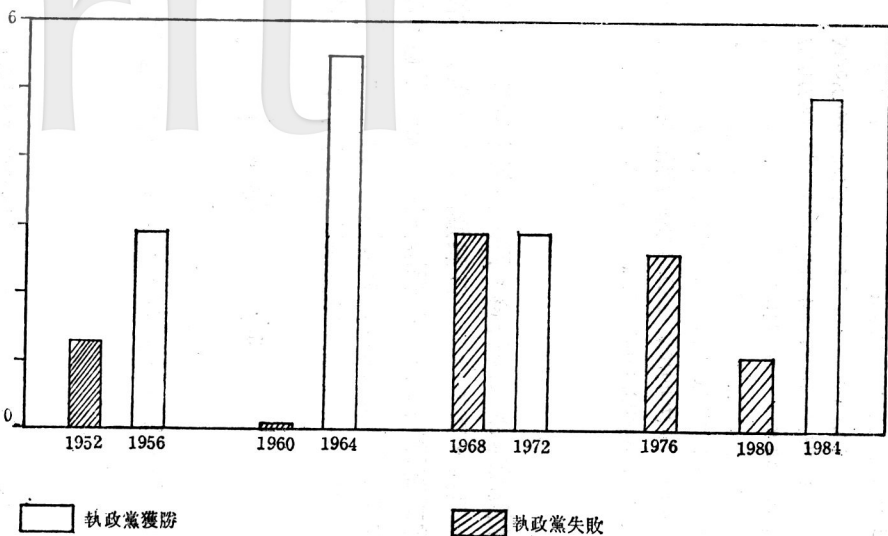
今(一九八八)年是美國總統選舉年，在無重大內政外交的議題下，經濟狀況將是重要的競選課題。共和黨將強調雷根任內的經濟復甦，民主黨要強調的則是巨幅聯邦預算及外貿赤字。①事實上，經濟狀況確實對總統選舉有相當影響。圖一概略顯示這種影響。②圖中線條代表選舉年個人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黑色的線條代表執政黨在大選中失敗，無法連任；白色的線條代表執政黨連任成功。觀察比較黑色、白色線條，我們發現當選舉年經濟狀況較好的時候(個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高)，執政黨多能連任成功。否則多半連任失敗。③本文概略探討經濟狀況對政治支持的影響。政治支持並不止包括選票(總統選舉或國會選舉)，

註① Cohen, Richard E., "Economic Theme Song", *National Journal*, Nov. 14, 1987, pp. 2884.

註② 本圖的原始統計數字資料出自 *National Journal*, October 24, 1987, p. 2660.

註③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二年比較)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例外原因可能是當年美國人民對越戰的厭戰程度。Douglas A. Hibbs, Jr. 和 Nicholas Vasilatos 以及 Michael B. Mackuen 用不同的計量學模型及資料庫，都顯示出越戰對總統聲望有相當影響。見 Hibbs, Douglas A. Jr. 及 Nicholas Vasilatos,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aas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ed. by Douglas A. Hibbs, Jr., et. al.,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 31-48. Mackuen, Michael B., "Political Drama,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May 1983, Vol. 27, No. 2, pp. 165-192.

圖一：選舉年個人可支配所得成長率與總統選舉結果的關係



還包括各大民意測驗機構（尤其是蓋洛普機構）對總統聲望所做的長期調查。^④

二、「經濟——政治支持」計量模型中的變數

要了解經濟狀況對政治支持影響的程度，必須設定一個計量模型，這個模型基本上是線性的。模型中各經濟參數（parameter）的估計值（estimate）就是經濟狀況對政治支持影響的程度。因為政治支持受到經濟性因素和非經濟性因素的影響，一個完整的政治支持模型就應該包括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本節概略討論通常被設定在政治支持模型中的幾類變數。

政治性變數。一般認為越戰、水門事件（包括福特特赦尼克森）在民衆對總統的支持上有特別的負面影響，所以大多數的政治支持模型都把越戰和水門事件設定成兩個獨立變數。前者的運作定義通常是每一季越戰的死亡人數（所以「季」為時間單位，是爲了配合以「季」為時間單位的經濟統計資料）；後者缺乏明確的運作定義，所以通常把受水門案影響的時期加上一個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即假設水門案的這段時間（如從一九七三年第四季到一九七四年第三季尼克森辭職），民意受到的衝擊強度是一樣的，其他時間則絲毫不受影響。^⑤其他的重要政治因素則包括美國民意向來有團結在國旗周圍的現象，也就是國家

註④ 蓋洛普機構自一九五三年起就開始調查民意對總統支持的程度。標準問題是「你是否同意（某某在職總統）在總統職務上的表現？」在早期，這樣的調查一年平均十二次，到了卡特總統時代，一年平均就有二十四次。總統聲望和投票主要的區別在於前者直接反應選民對總統表現的評估；後者則反應選民對兩位總統候選人之間的比較。

註⑤ 把越戰和水門案單獨列成獨立變數的例子，請見 Chappell Jr., Henry W. and William R. Keech, "A New View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85, Vol. 79, No. 1, p. 16.

遭到重大事件，民意通常支持政府措施。例如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伊朗人質事件發生前，民意同意卡特總統的職務表現只有三十二個百分點，四個星期後劇升至六十一個百分點。到了十二月聲望又開始下降，可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又把卡特聲望提高了三、四個百分點。⑥這種政治事件因素的運作定義，通常是以每季發生的這類國際事件數目為準。⑦麥肯(Michael B. Mackuen)的研究更進一步，他把所有的重要政治事件，不分國內或國外，加以分類，然後計算出各個政治事件對總統聲望的立即影響。⑧不過他的方法在一般的政治支持模型中，並不常被用到。如果政治事件，不列入模型中的獨立變數，政治事件(越戰和水門案除外)對政治支持的影響通常被假設成隨機的，可經由模型中的誤差項吸收。⑨

另外一個比較令人爭議的政治性變數是選民認同。許多研究都指出政黨認同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有相當影響。⑩政黨認同也影響選民對政黨政策表現(經濟政策包括在內)的評估。因此，如果不把政黨認同做為模型中的一個獨立變數，「經濟——政治支持」模型中顯現出的因果關係至少有一部份是假象。⑪但在不同的模型中，政黨認同會有不同的定義，通常用總體性時間數列資料(aggregated time-series data)的模型，政黨認同定義成選民對政黨(或不同政府)的長期支持；⑫如果是用個人民意調查資料(individual-level survey data)，政黨認同則是選民回答的政黨認同(通常是用密西根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政黨認

註⑥ Gallup Opinion Index, August 1980, pp. 24-26.

註⑦ 例見Kiewiet D. Roderick and Douglas Rivers, "The Economic Basis of Reagan's Appeal", in *The New Direc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ed. by John E. Chubb and Paul E. Peterso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 79.

註⑧ Mackuen, Michael B., *op. cit.*, pp. 174-176.

註⑨ 例見 Chappell and Keech, *op. cit.*: p. 16.

註⑩ Marcus, Gregory B., and Philip E. Converse, "A 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79, Vol. 73, No. 4, pp. 1055-1070. 例見 Page, Benjamin I., and Calvin C. Jones, "Reciprocal Effects of Policy Preferences, Party Loyalties and th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79, Vol. 73, No. 4, pp. 1071-1089.

註⑪ 如果我們有足够的理由該把政黨認同列入模型，却又不如此做，模型因而設定不足(under-specification)。設定不足可使得模型係數變異量的估計變成偏頗的(biased)，即使整個模型無效。見 Pindyck, Robert S. and Daniel L. Rubinfeld, *Econometric Models and Economic Forecasts*, a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1), pp. 128-130.

註⑫ 例如 Hibbs, *op. cit.*, p. 35. Bloom, Howard S., and H. Douglas Price, "Voter Response to Short-Ru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symmetric Effect of Prosperity and Rec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December 1975, Vol. 69, No. 4, pp. 11240-1254.

同七點量表) ⑬

時間變數。謬勒 (John E. Mueller) ⑭一九七〇年的研究，發現所有總統的聲望一定會逐漸降低。因為時間越久，總統做的政策決定就越多，也就有越多的人不滿意，因此時間或時間趨勢是一個重要的獨立變數。肯奈爾 (Samuel Kernell) 不同意。他認為時間只不過是許多實質獨立變數總合的代稱，把時間作為獨立變數，不顧時間包含的許多實質政策決定而設定的政治支持模式缺乏實質意義。⑮理論上，總統的聲望逐年降低，可能是一種自然的趨勢，跟總統的實際表現可以無關（這當然是假設，總統的實質政策決定通常可以影響他的聲望）以通貨膨脹為例子。假設前任總統在遏止通貨膨脹上表現不佳，現任總統一上任，選民可能對新總統的期望高（蜜月時期），又因為前任總統表現差，而給現任總統很高的期望。隨著時間過去，選民對前任總統的差勁表現已逐漸淡忘，而越來越重視現任總統的表現，即使通貨膨脹維持不變，現任總統的聲望也會越來越低。⑯在實際模型的設定上，時間趨勢有時並不列入獨立變數——但時間對總統聲望可能產生的影響則由其他變項吸收，⑰有時列入模型中的常數項，⑱有時列入變數項，⑲有時亦可列入變數項却對其係數加以限制。⑳

經濟性變數。用總體性時間數列資料的模型，其經濟性變數通常是一些常見的指標，如失業率，通貨膨脹率，實質國民生產毛額、個人可支配所得的成長率等。如果模型用的是個人調查資料，經濟性變數則包括受訪者的收入、是否就業、過去及未來以及前一年家庭財務狀況和現在的比較、對全國經濟過去一年的評估及來年的展望、對兩黨候選人（或總統）處理經濟問題的評估、受訪者個人在重要經濟問題上的立場等等。這些經濟性變數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爭論。在用總體性時間數列資料的政治支持模型

註⑭ 例四 Fiorina, Morris P.,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註⑮ Mueller John E.,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from Truman to John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70. Vol. 64, No. 1, pp. 18-34.

註⑯ Kernell, Samuel, "Explaining Presidential Popula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78, Vol. 72, No. 2, pp. 506-522.

註⑰ Alt, James E., and K. Alec Chrystal, *Political Econom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171.

註⑱ 例五 Hibbs, Douglas A., Jr., "Economic Outcomes and Political Support for British Governments among Occupational Classes: A Dynam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82, Vol. 76, No. 2, 259-279.

註⑲ 例六 Chappell and Keech, *op. cit.*; p. 15.

註⑳ 例七 Stimson, James A., "Public Support for American Presidents: A Cyclical Mode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6, Vol. 40, No. 1, pp. 1-21.

註㉑ 例八 Hibbs and Vasilaros, *op. cit.*, pp. 35-36.

，通常設定一個呈指數遞減的記憶折扣參數，使過去的經濟表現對現在政治支持的影響呈指數性的遞減。這是因為越往過去、選民的記憶越淡、過去的經濟表現對現在政治支持的影響也就越小。至於過去的經濟表現和現在的經濟表現間的差異，不同的模型通常用不同的時間遞延與加權平均來設定。

三、「經濟——政治支持」計量模型的設定

納入「經濟——政治支持」計量模型的變數本身容或差異不大，但是變數之間的結構往往有不同的設定；設定不同，經濟狀況對政治支持的影響也有不同的估計。所以會對變數結構有不同的設定，乃因模型設計人對選民如何決定他的政治支持態度有不同的觀察。

前瞻性或回溯性。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到底選民是以前瞻性的眼光 (prospective) 或以回溯性的經驗 (retrospective) 來決定他的政治支持。前瞻性的眼光是指選民對候選人的競選承諾做理性的「成本——效益」評估，看看他自己的期待效用在那位候選人的競選主張下，可以達到最大。過去的政績只被用來評估尋求連任候選人的競選主張是否可靠。^②如果選民以回溯性的經驗來決定他的政治支持，則指選民並不重視候選人的承諾。其對未來的期望主要基於他在過去政績下的個人經驗。對選民而言，用回溯性的經驗來決定政治支持比較容易些，因為前瞻性的標準對選民的理性要求太高，尤其是當候選人在政見上會存心曖昧不明^③，使選民無法比較。

若假設選民主要用過去的經驗來決定他的政治支持態度，^④則我們必須再進一步釐清下面幾個問題：

註② 有關前瞻性投票的重要概念見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艾布蘭森 (Paul R. Abramson) 等人對政策取向投票的界定又和前瞻性投票相似。見 Abramson, Paul A., John H. Aldrich, and David W. Rohde,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1984 Elections* [Washington, D. 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86], pp. 163-228. 艾特 (James E. Alt) 等人亦稱前瞻性模型為政策模型。見 Alt and Chrysal, *op. cit.*, pp. 153-155, 158-159.

註③ Alt and Chrysal, *op. cit.*, p. 159.

註④ 在概念上，我們可以區分前瞻性及回溯性的評估。但在實際上，這種區分很難。見 Miller, Arthur H., and Martin P. Wattenberg, "Throwing the Rascals Out: Policy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1952-19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1985, Vol. 79, No. 2. pp. 359-372.

選民決定政治支持的原則。他是否只評估執政黨這一任（在經濟政策上）的表現？²⁴還是假設如果這一任是反對黨做總統，表現可能如何，然後再把這個反對黨的假想表現和執政黨的實際表現並比評估？²⁵這兩種原則有重要的差別。例如，我們假設一九八八年的美國選民在投票時只考慮聯邦赤字。當然現在的共和黨政府有巨額的聯邦赤字，選民很不滿意，就要投票反對現任政府。但是如果選民認為如果從一九八〇年末由民主黨執政的話，情況也好不到那裏去，甚至更糟，選民就可能投票贊成現任政府。在經濟——政治支持計量模型的設定上，這個問題就等於問選民「過去（經濟性）經驗的確切比較標準何在？」——他是否只對執政黨執政期間經濟政績的加權累積總合，有所反應？²⁶或是只有當執政黨的經濟政績突然偏離了他習慣的程度，（例如假設選民已習慣了三%的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率現在却突升至七%），他對執政黨的政治支持才會改變？²⁷抑或是選民把執政黨繼承的前任政府的表現（即現在在野黨執政時的表現）也一併考慮進去？²⁸

過去經驗的內容。選民過去的經驗大約包括他的知識、資訊處理及期望。我們逐一概略討論。選民的經濟知識是過去經驗的重要部份。例如大多數的模型把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同時列入——意味著選民不了解這兩者間的抵換關係。²⁹屈伯（Henry W. Chappell, Jr.）和凱屈（William R. Keech）設計了兩個模型——一個假設選民知道這種抵換關係，一個假設選民不知道——結果發現前者對政治支持的解釋能力超過後者的解釋能力。³⁰不過到現在為止的研究還沒有人能確定選民的經濟知識到底有多少。甚至是否具備正確的經濟知識。跟知識有相當關係的是選民處理資訊的能力。大體而言，社會經濟地位高的選民比較能接收大眾傳播媒體的經濟資訊，也比較能掌握全國性的經濟狀況做爲他是否支持執政黨的參考；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選民則較少接

註²⁴ 這是凱（V. O. Key）的觀點。他認爲選民是「恩仇必報的神」，如果選民覺得執政黨的表現好，就值得再給一個任期，如果表現不佳，就得換在野黨上臺。所以選民在表達政治支持之時，就是對執政黨做信任投票，考慮點只有執政黨。見 Key, V. O. Jr.,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5th ed.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 1964), p. 568.

註²⁵ 這是唐斯（Anthony Downs）的觀點。見 Downs, Anthony, *op. cit.*, 。費爾福那（Morris P. Fiorina）又把這個觀點更進一步的詳細說明，見 Fiorina, *op. cit.*。在這個觀點上，選民的參考點有兩個：執政黨和反對黨。

註²⁶ 例如 Hibbs and Vasilatos, *op. cit.*, pp. 37-38.

註²⁷ 例如 *Ibid.*, pp. 38-39.

註²⁸ 例如 *Ibid.*, pp. 39-40。

註²⁹ 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短期內的抵換關係經濟學上以菲力普（Phillips Curve）曲線表之。見 Baumol, William J., and Alan S. Blinder,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olicy*, 2n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2), pp. 296-303.

註³⁰ Chappell and Keech, *op. cit.*, pp. 12-14.

收經濟資訊，對經濟政績的評估也傾向以個人經濟狀況為準。^⑩傳播與選民的資訊處理也因而有密切的關係。^⑪在選民過去的經驗中，對經濟表現的期望也是重要的一環。問題是期望是怎樣形成的。通常對期望形成的處理是假設期望是由一個適應過程所形成，亦即選民不斷比較過去與現在的期望以及實際政績與期待表現之差異。^⑫當然這個假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修正。^⑬

資料使用。模型設定不同，經濟對政治支持的影響也不同。但是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凡是用總體性時間數列資料的模型都顯示出經濟對政治支持有相當影響（通常可以解釋政治支持變異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可是在個人調查資料的模型中，經濟對政治支持的影響却不顯著，有時候係數的正負號還與我們期望的相反（例如，通貨膨脹上升反而有助政治支持）。^⑭照理說，用總體性時間數列資料的模型來推論個人的政治支持態度，是犯了區位謬誤（ecological fallacy）；個人的經濟與政治支持態度間的關係應該用個人資料來佐證才對。到底總體性資料顯示的結果有效，還是個人資料顯示的結果有效？克拉馬（Gerald H. Kramer）的數學證明，認為總體性資料比個人資料適宜用來研究個人的政治支持決定（即區位謬誤在「經濟——政治支持」模型設定上不存在）。這是因為利用個人資料產生的參數估計是非常偏頗的，可是總體資料却不然。^⑮因此，經

註⑩ 貝希布斯, Douglas A., Jr., "The Mass Public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Dynamics of Public Opinion Toward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1979, Vol. 23, No. 4, pp. 703-731. Weatherford, M. Stephen, "Economic Voting and the 'Symbolic Politics' Argument: A Reinterpretation and Synthesis,"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83, Vol. 77, No. 1, pp. 158-174.

註⑪ Mackuen, Michael B.,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Policy Agenda," in *More Than News* ed. by Mackuen, Michael B., and S. Coombs. (Beverly Hills: Sage, 1980).

註⑫ 用簡單的數學符號表示： $(E_t - E_{t-1}) = a(P_t - E_{t-1}) + b(E_{t-1} - E_{t-2})$ 式中的左邊是指前一期到現在期望的改變，式中的右邊是現在的表現和前一期（對現在）期望的差異。a 是 1 分數，表示調整異口在 1 部份會影響到下一期的左邊。

註⑬ 例如, Jacobs R., and R. Jones, "Price Expect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1975,"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80, Vol. 70, No. 3, pp. 269-277. 以及 Conover, Pamela Johnston, Stanley Feldman, and Kathleen Knight, "Judging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Origins of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s," in *Journal of Politics*, August 1986, Vol. 48, No. 3, pp. 565-588.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Economic Forecast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1, No. 3, pp. 539-583.

註⑭ 例如, Kinder, Donald R. and Riewiet, D. Roderick, "Economic Discontent and Political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Grievance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Judgments in Congressional Vo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ugust 1979, Vol. 23, No. 3, pp. 495-517.

註⑮ Kramer, Gerald H., "The Ecological Fallacy Revisited: Aggregate versus Individual-level Findings on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and Sociotropic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83, vol. 77, No. 1, pp. 92-111. 但克拉馬的個人資料，並不包括個人複訪資料 (panel data) 在內。

濟對政治影響的程度，不僅有賴於變數間結構的特殊設定，也有賴於資料的性質。

四、一個「經濟——政治支持」的模型以及一九八八年經濟對總統大選的可能影響

我現在用費爾 (Ray C. Fair) 的模型做爲例子說明經濟對政治支持的影響。^{註②} 所以用費爾的模型有三個原因。第一，費爾的模型設計很完整；^{註③} 第二，費爾在他的模型中測試許多不同的經濟變數，我們可以比較這些變數的相對解釋能力；第三，費爾模型中的依變數是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獲票率 (時間範圍自一九一六至一九七六年)，可以啓發我們了解經濟對今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費爾的模型及估計值如下： $V_t = 33.79 + 1.16\Delta Y_t + 0.726T_t + 3.52I_t + U_t$ 。其中 V_t 是民主黨在 t 年總統大選的獲票率； ΔY_t 是該年實質平均個人國民生產毛額的成長率； T_t 是時間趨勢； I_t 是當年是否由在職總統競選連任； U_t 是誤差項。這個模型的詮釋如下：實質平均個人國民生產毛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民主黨在總統大選的全國獲票率就增加一·一六個百分點，其他變數維持不變；就全國的長期趨勢來看，對民主黨有利；如果民主黨的現任總統競選連任，則可增加百分之三點五二的獲票率。

費爾把他的模型修正，再加入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的資料，計算出在不同的實質平均個人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 (以選舉年四至九月兩季的成長率爲準) 以及選舉前兩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之下，民主黨在今年總統大選中的獲票率，見表一。^{註④} 表一的數字是民主黨的獲票率，超過五〇%則民主黨入主白宮，低於百分之五十則繼續是在野黨。我們如果不考慮誤差，再假設今年的

註② Fair, Ray C., "The Effect of Economic Events on Votes for Presiden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ay 1978, vol. 60, No. 2, pp. 159-173.

註③ 費爾的模型設計可以容納克拉馬 (Gerald H. Kramer) 的模型及史提格勒 (George J. Stigler) 對卡拉馬模型的批評。克拉馬的模型已成爲「經濟——政治支持」研究中的古典作品。見 Kramer, Gerald H., "Short-Term Fluctuations in U. S. Voting Behavior, 1896-1964,"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71, vol. 65, No. 1, pp. 131-143. 但是史提格勒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却大不同意克拉馬的模型設定。見 Stigler George J., "Gener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National Election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3, vol. 63, No. 2, pp. 160-167.

註④ Fair, *op. cit.*, p. 168.

註⑤ Rauch, Jonathan, "Election-Day Economy," *National Journal*, Oct. 24, 1987, p. 2660.

經濟情勢與去年差不多（一九八七年通貨膨脹率5%左右，實質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大約1.5%），則在通貨膨脹率百分之五的那一欄，以及成長率1%的那一欄的交點，我們可以看出見民主黨在十一月的大選可以得到四九.5%的選票。所以今年經濟情勢不變的話，大選將對共和黨有利。

表一 民主黨在1988年總統選舉中獲選率依經濟狀況的預測。

項 目	通 貨 膨 脹 率						
	2 %	3 %	4 %	5 %	6 %	7 %	
成 長	52.6%	52.9%	53.3%	53.6%	54.0%	54.3%	
	51.6	51.9	52.3	52.6	53.0	53.3	
	50.5	50.9	51.2	51.6	51.9	52.3	
率	49.5	49.9	50.2	50.6	50.9	51.3	
	48.5	48.8	49.2	49.5	49.9	50.2	
	47.5	47.8	48.2	48.5	48.9	49.2	
	46.5	46.8	47.1	47.5	47.8	48.2	

- a. 1987, 1988二年通貨膨脹率之年平均。
- b. 成長率係1988年二、三兩季的實質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年成長率預估。
- c. 觀差是3%。